

編後語

本期的「百年中國」是摘編「胡適與現代中國文化」研討會上八篇論文而成的專輯，從中大致可以看出本世紀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命運。出席這個會議的大陸、台灣、美國及本港學者，表現出了強烈的學術交流和溝通的興趣。也許，這是因為儘管今天是信息通訊發達、追求價值多元的時代，但人們卻更加為文化與文化之間、人與人之間的難以溝通而深深苦惱。

康丹介紹了西方亞洲研究中的文化相對主義和普遍主義，他指出一個令人深思的兩難：中國知識分子為了本國的現代化在追求一些普遍價值（例如民主、人權）的時候，往往忽視某些重要的西方思潮；而西方學者為了尊重非西方文化，在探討着非西方文化背景的學者不感興趣的問題。伍曉明針對劉再復〈告別諸神〉一文提出的「概念借貸」、「語言暴力」、「價值多元」等問題，指出除了完全拋棄「思想」和「語言」，人們無法超越它們的限制，而「價值多元」也含有否定自身的悖論。趙毅衡用西方文藝理論解剖中國古典戲劇《白兔記》，並一反五四以來強調通俗文學的進步性的見解，提出俗文學一方面在道德倫理說教上比上層文化更徹底更保守，另一面又追求擺脫意識形態色彩的生動表現形式之間的內在悖論。司徒立是有中國文化背景的畫家，却能細心體認當代具象表現派大師賈克梅第的繪畫，表現出這一派畫家對「存在」、「觀看」和生命意義的孜孜不倦的思考和追尋。王紹光在認真梳理西方學者關於 Civil Society 的概念後，提出了自己對市民社會與民主政治之間關係的看法，並認為那種視資產階級民主為理想民主政治的看法是「太短視了」。

十月初，本刊收到何炳棣批評杜維明及新儒家治學方法的文章，我們經諮商後決定請杜維明以兩、三個月做回應後同期發表。但杜看過何文後決定先行做出簡短初步回應，所以現在兩位著名學者的文章一併在本期「批評與回應」欄刊出。相信這次討論會引起海內外學者的關注，並且會有其他學者加入討論。

與上期介紹的活潑的陳進華君不同，編輯助理岑淑群是最文靜寡言、拘謹自持的一位小姐。一年來，她在每個工作日反覆仔細校對文稿的敬業精神，給同事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。現在，她已成為香港浸會學院英文系的學生。我們預祝她學業成功，同時，又迎來年輕的范頌基先生和黎美霞小姐加入編輯室工作。